# 政府考察学习如何影响政策扩散？

## ——以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为例

杨　志　魏　姝*

**摘要：**

【问题】“取经学习”是地方政府实现政策知识转移与政策扩散的有效渠道，既有文献对横向府际考察学习与政策扩散的逻辑关联缺乏系统阐释。府际考察学习对政策扩散的演化过程存在何种影响？其影响又借由何种作用机制得以实现？

【方法】论文以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为案例，基于政府官网信息及新闻报道，提取出考察学习活动数据及建设进度数据，借此对其政策扩散过程及附属考察学习活动进行深度追踪与剖析。

【发现】（1）考察学习作为一种信息交流渠道实现了政策知识在源创新者与潜在采纳者之间的转移，影响潜在采纳者的政策认知效能和政策执行绩效；（2）就作用机制而言，考察学习通过“知识转化机制”实现了对外部政策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有效获取，“距离调节机制”以辅助角色加速政策知识转移过程；（3）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知识源呈现“一核多源”的扇状分布结构，满足了学习者的异质性知识需求，增加了政策扩散网络的渠道及节点密度，在两大机制共同作用下加速了其政策扩散过程。

【贡献】本文构建了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扩散的过程分析框架，并揭示了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扩散的作用机制，增进了对地方治理中广泛存在的“取经学习”行为的理解。

【关键词】政策扩散　考察学习　横向府际关系　知识转移　政策爆发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20）05－0160－21

【政策之窗】

☼ 府际考察学习实现了源创新者与潜在采纳者的“面对面”联结，为政策创新知识转移与政策扩散创造了有利条件。

☼ 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政策源创新隐性知识的获取与运用，是决策者借助考察学习活动提升自身治理效能的关键。

* 杨志，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魏姝，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感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魏旭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105）。

## 一、问题的提出

学习机制是政策扩散动力机制的一套经典解释逻辑（Walker，1969；Glick & Hays，1991；Mooney & Lee，1995），以学习机制为核心基础的高适应性体制亦被视为塑造“中国模式”的关键因素（王绍光，2008）。在实践中，赴先进地区“取经学习”是中国地方政府增强自身治理能力的一种普遍行动策略，韩博天（2008）曾以“政治旅游热”来描述中国分级制政策试验过程中的“学典型”的现象。府际考察学习①的预期目标是借助先发地区的政策知识分享，为学习者自身决策制定寻求有益线索，显然，这种政策知识在不同治理主体间的转移过程与政策扩散的核心意涵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

现有政策扩散知识传统对学习机制的探讨主要包含两大路径：其一，将“学习”视为一种与竞争、压力和社会化相异的宏观作用机制（Berry & Berry，1990；Shipan & Volden，2012），强调其作为动力触发机制对政策采纳决策制定过程的形塑作用，但是对“学习”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实现政策知识传递的微观过程缺乏深入探讨。其二，将“学习”视作一种静态的知识转移过程，着重考察以文本资料为知识载体的府际政策学习行为，相对忽视了对基于“人际互动”和“现实场景”的动态学习方式的考量。此外，与联邦制政策扩散研究对以横向府际关系和学习机制为基础的州际政策学习现象的关注不同，本土化政策扩散研究侧重于剖析纵向府际关系和压力机制作用下央地政府间的政策学习过程。因此，在本土化政策扩散研究成果中，横向府际学习行为对政策扩散过程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讨论，尤其是对以实地参访交流为特征的考察学习现象的分析更显匮乏。

事实上，考察学习作为连接潜在采纳者与源创新者之间最为直接的信息交流渠道，对政策扩散的微观演化过程亦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当前，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挂牌数量正与日俱增，地方政府间以此为主题的考察学习活动也在密集上演，这为我们探讨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对政策扩散的影响、特别是揭示其作用机制提供了一个极佳案例。本文将以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为案例，对以下核心问题展开研究：第一，横向府际考察学习活动具有哪些一般特征？第二，这些特征对政策扩散的过程演化及模式塑造存在何种影响？第三，横向府际考察学习活动的发生究竟以何种作用机制对政策扩散过程产生影响？

---

① 本文所称“府际考察学习”均指同级地方政府间的实地参访学习行为。

## 二、文献述评与理论框架

### （一）学习机制：政策创新与政策扩散的一种核心机制

政策创新意味着“某一政策对于采纳它的主体而言是新的，无论其已经存在多久抑或有多少其他地方已经采纳过它”（Walker，1969），对创新内涵“非原创性”界定的认同，源自学者们对实践中广泛存在的知识学习行为的经验观察。受20世纪中叶日渐兴盛的有限理性决策及渐进决策模型影响，肇始于此一时期的早期政策扩散研究普遍假设，当面临复杂决策情境时，决策制定者会通过学习的方式从那些“最佳实践”中探取决策捷径（Walker，1969；Berry & Berry，1990；Glick & Hays，1991）。Graham等人（2013）对逾百种政策扩散机制术语的梳理发现，它们在实质上可归纳为学习、竞争、强制和社会化四类，通过该结论我们亦不难窥探，将学习视为一种核心作用机制的观点在西方政策扩散研究领域拥趸甚众。

早期本土化政策扩散研究致力于对西方政策扩散理论进行综述式译介（朱德米，2007；朱亚鹏，2010），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并继承了其核心知识传统。就扩散机制而言，国内学者亦普遍认为，学习机制与压力机制和社会化机制等互为竞争性解释逻辑，对分析中国政策扩散现象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王浦劬、赖先进，2013；定明捷、张梁，2014）。但是，扩散机制强调的是“某一政策选择是如何被其他政府的选择所影响的过程”（Berry & Berry，1990），将“学习”视作一种宏观过程机制的角色定位，无意间把研究注意力固定在对不同动力触发机制下采纳决策制定过程的差异比较上，并进一步引申出对不同作用机制下可能存在的政策执行绩效差异的探讨，而对于政策学习行为的微观运作机理则缺乏相对细致的追踪与剖析。

### （二）府际考察学习与政策知识转移：中国地方政府政策扩散的隐形渠道

Rogers（2003）将创新扩散定义为“一项创新在一段时间内经由某些渠道在某一社会系统的成员间进行交流的过程”，创新、沟通渠道、时间和社会系统是这一复杂政策演化过程的基础构件。就其过程而言，实现政策信息在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扩散必须依赖于某些特定的沟通渠道，大众传媒渠道、人际渠道以及互联网渠道是其常见形式（Rogers，2003）。就其内容而言，政策扩散主客体间所交流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源创新所蕴含的“新知识”构成的。Polanyi（1966）认为知识存在“显性（Explicit）”和“隐性（Tacit）”之分，显性知识

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和图形等编码化的形式呈现，并借由各类中介载体进行传播，而深嵌于实际操作过程的“感悟和诀窍（Know-how）”类隐性知识则具有不易表达性。“通过人际交流网络进行知识的发送和接受是目前实现隐性知识有效传递的基本方式”（常荔等，2001），而在政策知识的转移过程中，府际考察学习即是此类人际沟通渠道的拓展形式。

政府间的组织学习是政策扩散得以实现的隐形机制（林雪霏，2015），综观中国改革开放40年政策变迁之历程，考察学习活动遍布于地方政府的各个层级，涉及政府治理的诸多方面，“那些得到大规模扩散的政策创新的创生地，通常都要承担大量的来访接待任务”（Ma，2017）。整体上，中国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考察学习活动主要包含两大类型：一类是综合性考察学习，即地方政府对某一同级治理主体在政府治理、经济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经验的全方位系统性学习。此类活动通常发生于学习者与其确立的“标杆”之间，常以由“一二把手”挂帅的党政考察团的形式出现。另一类是专题性考察学习，即地方政府的一个或多个职能部门对某一典型创新经验的专项学习。此类活动则主要发生在学习者与特定政策创新的“首倡者”或“典型”之间，学习目标随着学习主题的变化而灵活变动，学习主体多为与相关议题领域对应的专属职能部门。本文所探讨的考察学习活动主要涉及后一类型。

马亮（2011）基于垂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与水平（竞争与学习）两个方向的四个维度搭建了府际关系影响政策扩散的分析框架，诸多研究者（周望，2012；杨代福，2013；朱旭峰、张友浪，2015；朱多刚、胡振吉，2017等）从不同视角阐释了以“吸纳—辐射”为典型模式的政策试点或地方创新扩散过程的生成机理，认为“自下而上”的政策吸纳与“自上而下”的辐射推广构筑了本土化政策扩散过程的双向交流机制，强调了上级政府的约束与激励作用对下级政策采纳行为的影响。杨宏山等人（2019）进一步归纳出在中央政治权威主导下央地政府通过多轮纵向交流进行政策制定的M型及W型府际学习路径。整体而言，现有文献的讨论焦点呈现出重垂直维度的央地关系，轻水平维度的同级政府关系的倾向，即便有研究给予横向府际关系足够关注，也主要将笔墨倾注于同级政府间的竞争压力（赵强，2015；朱旭峰、赵慧，2016）或干部空间流动（张克，2015；朱光喜、陈景森，2019）等因素对政策扩散过程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横向府际考察学习行为对政策扩散的作用。

当然，一些研究者已经发现，府际交流互访作为一种政策学习工具贯穿于新农村建设（李云新、刘建平，2011）、招商引资（王浦劬、赖先进，2013）和特色小镇开发（姚尚建，2017）等政策创新过程之中。遗憾的是，既有研究并未进一步系统剖析府际考察学习与政策扩散的逻辑关联。Ma（2017）对中国

公共自行车项目扩散过程中城市间实地考察（Site Visits）行为的研究表明，“具有相似属性的邻近城市更倾向于相互学习，考察学习频次、考察团规模及考察活动时长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政策采纳概率”，这是本土化研究聚焦于探讨府际考察学习与政策扩散关系的鲜有尝试。综合上述，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横向府际考察学习活动过程及特征的归纳，阐释其在微观层面上作为一种政策知识交流工具对政策扩散过程的可能影响，并进一步揭示其作用机理。

### （三）理论框架：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扩散的潜在机理

#### 1. 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扩散的潜在过程机制

政策学习是政策知识从知识源到知识受体的转移过程（Szulanski，2000），但“实现真正的知识转移还必须有一个知识重建的过程”（Davenport & Prusak，1998），由此可将政策学习行为视作由“知识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再生产”①三个环节组成的知识转移过程。政策采纳通常包含认知、说服、决策、执行和确认等五个阶段（Rogers，2003）。实际上，“说服”是对外部信息的倾向判别过程，“确认”是对政策执行过程的反馈，因此可把“认知—说服”及“执行—确认”的过程分别合并，将政策扩散过程简化为“政策认知—采纳决策—政策执行”三个阶段。鉴于“政策采纳过程本质是个体为减少不确定性而进行的信息（知识）搜寻与处理过程”（Rogers，2003）的经典判断，可将政策学习过程与政策扩散过程相连接。如图 1 所示，横向府际考察学习作为一种交流渠道实现了政策知识在源创新者与潜在采纳者之间的转移，至少在政策采纳决策制定的前、后两个阶段对政策扩散演化过程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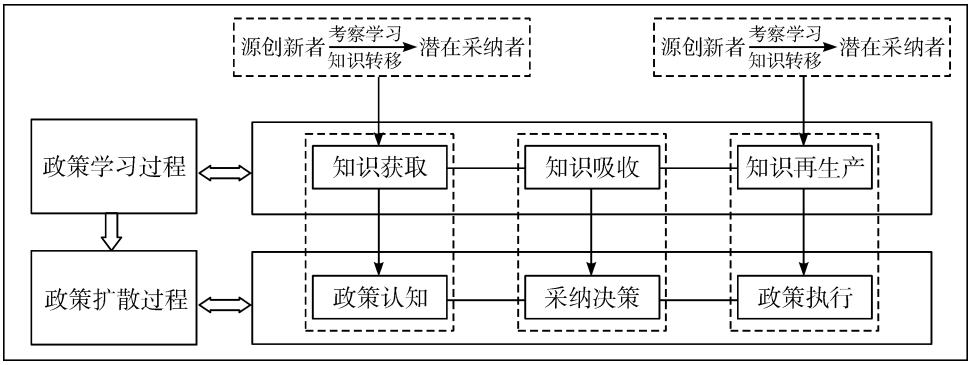


**图 1　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扩散的过程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实际上，知识吸收环节与知识再生产环节的界限存在一定模糊性，两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时序关系，为了凸显知识再生产在政策学习与知识转移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此处我们将其视作两个并列环节。

在采纳决策制定之前，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认知过程。地方决策者知识存量与任务目标的不匹配是诱发政策学习行为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在面临一些紧迫性议题的情境下，时间约束通常不允许决策者通过自我学习的渐进过程完成知识积累，此时“外部知识源不管对于处在哪个层级的创新主体都变得至关重要”（Cohen & Levinthal，1990）。此一阶段，考察学习通过提升知识获取效能改善潜在采纳者对源创新的政策认知水平，政策认知作为前置环节催化政策采纳决策的制定过程①，采纳决策制定周期的缩短抑或采纳概率的提升，都将对政策扩散时空模式特征的塑造产生深远影响。

在采纳决策制定之后，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执行过程。在决策执行阶段，政策采纳者可能再次面临知识存量不足的境况，新一轮政策学习循环由此触发。通常，此一阶段的学习者具有更加强烈的学习意愿与更加明晰的问题意识，系统内部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亦更加充足。考察学习可以进一步降低政策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考察学习后的知识再生产环节可以实现政策执行方案和政策工具的适应性调整，对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反馈与纠偏，进而有助于政策执行绩效的提升。此外，由于“知识吸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受体的原有知识基础及认知结构”（Cohen & Levinthal，1990）而非其是否开展学习活动，故本文暂不对其进行重点探讨。

2．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扩散的潜在作用机制

府际考察学习作为一种知识转移过程，其作用机制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与知识转化的一般过程机制存在交叠。Nonaka（1994）根据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转化过程提出了著名的“知识转化螺旋模型（SECI）”，其中，通过观察、模仿和练习等非语言形式将（他者）隐性知识转化为（自身）隐性知识的过程被称为“社会化”，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过程被称为“外部化”，对多种显性知识的组合过程被称为“整合化”，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过程即为“内部化”。整体而言，“知识的发展过程就是隐性知识不断向显性知识转化和新的显性知识不断生成的过程”（Nonaka，1994）。因此，最大限度地实现对隐性知识的获取及对显性知识的运用，是考察学习促进政策扩散的关键。

①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考察学习行为本身蕴涵着潜在采纳者的强烈采纳意愿，但是考察学习行为的发生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政策采纳与扩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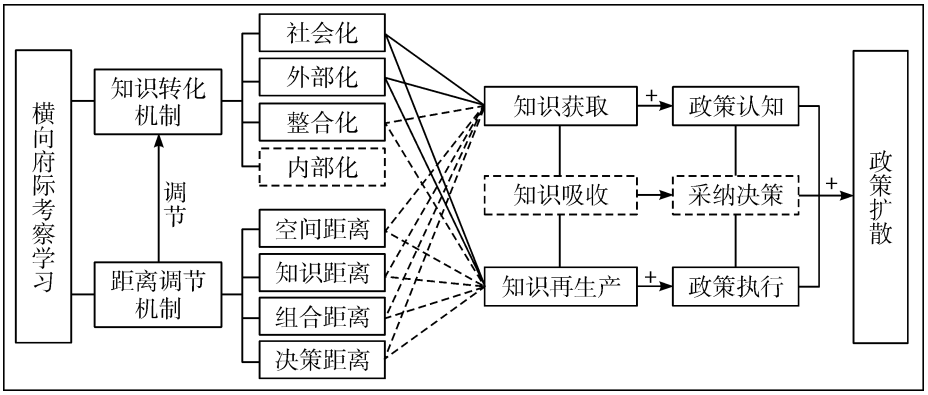


**图 2　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扩散的潜在作用机制**

注：——表示必然关系，- - - -表示或然关系，+表示促进作用，[- - - -] 非本文讨论重点。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图 2 所示，一方面，以人际交流、现场观摩和参与式体验为特征的考察学习活动实现了知识转移双方的“共同在场与互动”（余光胜等，2006），既为获取隐藏于过程和行为之中的隐性知识提供了有效工具，亦创造了有利于知识吸收和转化的学习情境，使得知识转化的“社会化”及“外部化”过程成为可能；同时，考察学习过程具有动态调整和螺旋增进的特征，学习者在“不断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知识的同时又不断向其他组织和个人输送新知识”（Gilbert & Cordey - Hayes，1996），部分学习者从知识输入者向知识输出者的转变过程丰富了外部知识源的数量及分布结构，为知识转化“整合化”过程的实现奠定了基础。考察学习活动的上述两大特征契合了政策知识转化的条件需求，能够有效提升知识获取及知识再生产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政策认识及采纳决策的执行过程。由此，我们假设，知识转化机制是横向府际考察学习促进政策扩散的关键性作用机制。

另一方面，政策知识转移发生于特定的“关系情境”之中（Cummings & Teng，2003），有关知识发送者与接收者在物理空间、知识基础和组织结构等方面的非对称性与知识转化效能的关系在组织学习领域已多有论述。通常，空间距离与知识获取过程中的时间及资源消耗成正比（Cohen & Levinthal，1990）；知识距离意味着主客体间“共有知识的多少”（Dixon，1994），适当的知识距离更易于对外部知识的理解与运用；组织距离表现为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的差异性，相近的组织制度有利于组织间的知识共享（Cummings & Teng，2003）。本文进一步提出“决策距离”的概念，用以表示考察学习活动代理者与决策制定和执行核心之间的信息传输距离，它由两者间的行政职务与级别差异决定。简

言之，距离调节机制是指由于考察学习主客体间空间距离、知识距离、组织距离，以及考察学习主体内部决策距离的缩短对知识转化效能的影响机制。它有助于加快知识获取及再生产的“速度”，进而提升政策认知效能并缩短采纳决策的制定周期。但是，在不同的政策案例中，距离调节机制是否存在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具有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它与政策属性特征及相关主题考察学习活动的过程特征密切相关。由此我们进一步假设，距离调节机制对政策知识转化效能具有中介调节作用，是横向府际考察学习促进政策扩散的辅助性作用机制。

## 三、案例选择及数据收集处理

### （一）案例选择

一定程度上，既有本土化政策扩散研究对横向府际考察学习现象关注的不足是囿于研究数据的可得性。从研究方法上讲，“当研究者有机会去观察和分析先前无法进行的科学现象时，适宜采用单案例研究设计”（殷，2004）。选择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作为研究案例，一方面是因为它在市级层面的扩散过程已基本完成，累计采纳频率趋近饱和状态，同时，其政策扩散过程伴随着大规模的府际考察学习现象，此类府际交流活动通常会在地方政府门户网站上以“地方要闻”或“部门动态”的形式得到报道和披露，保证了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及权威性。另一方面，就政策内容及知识属性而言，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在整体上属于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占比大致相当的知识均衡型政策①，其政策扩散过程和以此为主题的考察学习活动能够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政策知识在不同主体间的转移过程以及不同属性知识间的转化过程，较好地契合了案例选择的典型性和一般性原则。简言之，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为府际考察学习研究的可操作化提供了绝佳的“极端个案”，本文期望通过对其政策扩散过程及附属府际考察学习活动的追踪，为剖析横向府际考察学习行为与政策扩散过程的逻辑关联提供有

① 理论上，基于政策内容及知识属性两个维度，根据特定政策内容中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构成比重，可将公共政策大致划分为以显性知识为主的政策（如河长制、“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及政务新媒体应用政策等）、以隐性知识为主的政策（如医药价格改革、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及“多规合一”政策等）以及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相均衡的政策（如特色小镇政策、“最多跑一次”改革及网格化管理政策等）。但实践中，由于政策知识构成的复杂性，根据知识属性划分政策类型在客观上存在较大操作难度。

益的知识积累。

2018 年 8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作出“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指示；中宣部随即于同年 9 月 20 日至 21 日召开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并提出“2018 年先行启动 600 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到 2020 年年底要基本实现在全国的全覆盖”的总体目标；其后，中央深改委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伴随着中央层面在短时内的密集干预，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热度快速攀升，短时内在全国范围急剧扩散。

对于绝大多数地方政府而言，“县级融媒体中心”是一个全新概念，其建设过程不仅涉及物理空间改造和软硬件设备升级（多为显性知识），更关涉全媒体理念创新、机构改革及编制调整、运营机制和工作流程再造以及全媒型人才培养等若干维度（多为隐性知识）。一方面，刚性的任务指标和时间约束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快速完成政策采纳议程设置及决策制定过程；另一方面，这一系统工程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操作难度，政策的落地执行以及融媒体中心建成后的运维和管理工作，亦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一项挑战。因此，赴政策先行地区“取经学习”或“对标学习”成为地方政府推进该工作的普遍策略选择。如前所述，作为一项正式的政府行为，考察学习活动通常会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于地方政府（尤其是被考察学习对象）的门户网站之上，为本研究的案例选择及数据获取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切口。

### （二）数据收集及处理

在数据收集方面，通过观察可知，对于尚未采纳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地方政府，考察学习主体多为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党委宣传部门或承担融媒体中心实际建设工作的广电业务部门，而对于部分已经挂牌成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地方政府，亦存在以融媒体中心为单位直接出访学习的行为，因此，我们首先将数据检索关键词设置为“地方政府名 + 宣传部/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 + 考察学习融媒体中心”三种。其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 年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① 获取县级行政单位名录，并结合关键词进行逐次检索，通过检索出的新闻报道内容提取县级融媒体中心考察学习活动数据。同时，以“地方政府名 + 融媒体中心挂牌/成立/招标/招聘”为关键词，获取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进度数据。

① 详见 http：//www. stats. gov. cn/tjsj/tjbz/tjyqhdmhcxhfdm/2018/index. html。

在数据处理方面，首先通过数据整合建立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府际考察学习活动数据库，包含考察学习活动的时间、主客体、考察主体行政层级、（被）考察学习频次以及建设进度等方面。其次，对数据进行清洗，剔除地方政府对融媒体中心建设方案供给方（如科技公司、传媒公司等）的考察数据，仅保留政府机构间的活动数据。截至2019年7月31日，共获得包含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的有效数据1166条，进一步提取出以县级行政单位为主客体的有效数据1014条。此外，对相关新闻报道中除上述数据信息以外的其他文字内容信息进行归纳与统计，以此作为判定府际考察活动“学习内容”及“学习方式”的主要依据。

## 四、案例呈现：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考察学习活动及其政策扩散过程

### （一）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考察学习活动的全景描述

整体而言，府际考察学习活动的微观运行过程主要涉及主体、客体、内容及方式四大方面，分别对应“谁去学”“向谁学”“学什么”及“怎么学”的问题。从广义角度观察，考察学习主体是指出访学习的政府或部门，而从狭义角度审视，考察学习活动则需要通过代理者来实现，所谓代理者，即那些代表组织奔赴目标地开展学习活动的个体或机构。根据代理者的行政级别及规模属性，本研究将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考察学习主体划分为六类。数据显示，1.34%的考察团由县委书记直接带队，半数（50.09%）由担任常委的分管副书记或宣传部长带队，38.84%的考察团由宣传部副部长或广电台长及融媒体中心主任带队。此外，亦有少数考察学习活动以组团的形式出现，其中省团、市团各占1.52%和6.25%。

“向谁学”即考察学习对象的选择问题。数据表明，本案例中考察学习对象选择主要遵循择优原则、邻近原则及对口原则。

其一，就特定对象被考察学习频次的数量分布结构而言，愈七成（73.45%）考察学习活动集中指向被考察学习频次排名前20%的目标地，而处于被考察学习频次排名后70%的目标地仅存在不足总量两成（19.23%）的考察学习活动。这一非均衡的数量分布结构充分说明，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存在少数“明星城市”，那些因创新政绩突出被树为典型的城市成为重要的学习对象，若从学习者的角度观察，意即其考察学习对象的选择遵循择优原则。

其二，就考察学习活动的地理空间跨度而言，70.71%的考察学习活动发生

在省域范围内部（其中市内县际占23.02%，市外省内县际占47.69%），29.29%的考察学习活动则跨越了省界。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省际考察学习活动中亦有一部分只是到相邻省份。例如，湖南省的所有地级市均有多个县级政府到湖北省赤壁市学习。因此，就空间距离而言，考察学习对象的选择整体遵循邻近原则。

其三，选择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作为学习目标是一条普遍规则，在本案例中考察学习对象选择的“对口原则”还集中体现在另外两个方面（见表1）：一方面，一些中西部边远地区的城市会选择与其存在固定合作关系的中东部地区城市作为考察学习对象，表现为诸多发生在扶贫援助及合作发展框架内的对口地域间的考察学习；另一方面，学习者会选择那些与自身组织结构相似的治理主体作为考察学习对象，体现为高新区或示范区之间的考察学习。

**表1　考察学习对象选择的“对口原则”案例**

| 类型 | 关系框架 | 案例（学习者—被考察学习者） |
|---|---|---|
| 对口支援 | 援疆 | 新疆奇台县—福建永泰县，新疆呼图壁县—福建新罗区，新疆博州—湖北赤壁市，新疆双河市—湖北赤壁市，新疆尼勒克县—江苏武进区，新疆建设兵团第七师—江苏洪泽区，新疆奎屯市—江苏邳州市，新疆疏勒县—广东番禺区 |
| | 援藏 | 西藏拉萨市—江苏洪泽区，西藏拉萨市—江苏邳州市，西藏日喀则市—上海虹口区，西藏昌都市—福建尤溪县，西藏类乌齐县—重庆潼南区 |
| | 援青 | 青海都兰县—浙江金东区 |
| 帮扶合作 | 京蒙帮扶 | 内蒙古巴林右旗—北京密云区，内蒙古兴和县—北京延庆区 |
| | 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 | 吉林延边安田县—浙江宁波奉化区，黑龙江七台河勃利县—广东江门台山县 |
| | 东西扶贫协作 | 湖南湘西龙山县—山东济南市中区，甘肃天水市—天津市 |
| 组织结构 | 高新区—高新区 | 山东青岛高新区—陕西西安高新区，陕西西安高新区—四川成都高新区，陕西咸阳高新区—四川成都高新区 |
| | 示范区—示范区 | 湖南株洲云龙示范区—湖南湘潭昭山示范区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学什么”即考察学习内容的构成问题，对创新的认知通常包含创新是什么、创新如何运转以及创新为何能有效运转三个方面。从公开报道来看，其一，学习者会从宏观层面了解目标地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创新理念、发展历程及整体概况；其二，学习者会从中观层面了解学习对象的政策设计方案，包括机构设置、平台架构、薪酬绩效管理及建设运营模式等多个部分；其三，学习者会从微观层面了解学习对象的运行流程及功能机理，涵盖功能模块设置、内容生产发布、图文视频转播技术及全媒人才培养模式等若干方面。

“怎么学”即考察学习活动的开展方式问题。根据相关报道，本案例考察学习活动主要存在影像资料观赏、实地观摩体验和座谈交流等三种形式。诸如浙江长兴、河南项城、江西德兴等高频被考察学习对象均制作了融媒体中心建设专题片，以便来访者通过观看宣传片初步了解其建设历程及运行概况。学习者会对演播大厅、指挥调度中心、采编制作中心等进行实地参观，察看融媒体中心的物理功能空间，同时通过现场演示、连线互动等方式，对“中央厨房”“智慧平台”和 APP 客户端等软硬件设施的运作流程及效果进行直观感受。学习者会通过与目标地融媒体中心负责人及技术人员开展座谈交流，听取其经验分享并结合自身实际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度探讨。

### （二）“一核多源”的扇状外部知识源分布结构

对特定政策创新而言，“被考察学习的频次”和“来访者的空间分布范围”① 是其政策吸引力与辐射力的充分反映，本研究据此绘制出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外部知识源的散点分布图（如图 3 所示），以期通过对外部知识源分布结构特征的描述，更好地理解其考察学习活动的发展过程。

① 通常情况下，考察学习主客体间的空间距离越远，说明政策创新的吸引力和辐射力越强，故而此处选择特定政策创新所能辐射的“外省数量”作为“来访者空间分布范围”的衡量指标。图中“辐射外省数量”为 0 的被考察学习对象，说明其政策创新仅对省（市）内城市具有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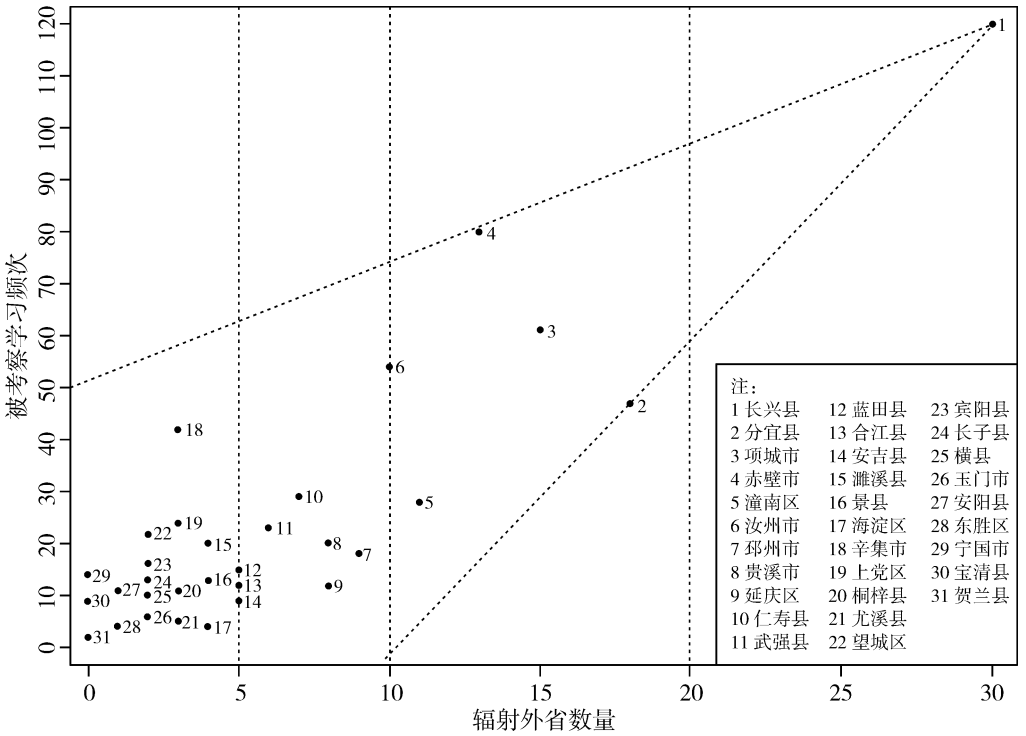


**图 3　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外部知识源散点分布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图 3 所示，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外部知识源在整体上呈现出“一核多源”的扇状分布结构，该结构以政策源创新地为顶点，以少数“明星城市”为次级全国性知识源，辅之以众多不同层级范围内的区域性知识源。具体而言，位于扇状结构顶点的浙江长兴是该政策的源创新地，亦是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的召开地。位于第二梯队的是江西分宜、河南项城、湖北赤壁、重庆潼南以及河南汝州，此五地多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先行者，各自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模式，成为全国范围考察学习活动发生的次中心。位于第三梯队的是四川仁寿、河北武强、江西贵溪、江苏邳州、北京延庆及陕西蓝田等，此类地方政府多为若干相邻省份范围内的学习焦点。更多的散点则分布于扇状结构的圆弧边缘地带①，典型城市包括河北辛集、山西上党、湖南望城、安徽濉溪、贵州桐梓、广西宾阳、山东宁津、黑龙江宝清及云南芒市等，此类城

① 实际上，279 个被考察学习对象中的 265 个都集中分布于此一区域（辐射外省数量小于 5），但是在同一坐标系内具有相同坐标的城市仅能呈现为一个点，因此图中仅汇报了极少数代表性城市的名称。

市多为某一省或地级市范围内的先行试点市县，亦是省级或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会的主办地，扮演着省内或市内被考察学习典型的角色。

### （三）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扩散过程及其扩散曲线

就扩散过程而言，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遵循“地方首创—中央吸纳辐射—地方跟进采纳”的一般过程。具体而言，2011 年 4 月，浙江省长兴县整合县域媒体资源组建“长兴传媒集团”，并于 2017 年 4 月成立融媒体中心，实现了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源创新的建构过程；自 2018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起，中央层面通过一系列密集干预行为将其正式吸纳为一项全国性政策方案，同时对其进行大力宣传推广；其后，各地纷纷进行跟进式采纳，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在全国范围急剧扩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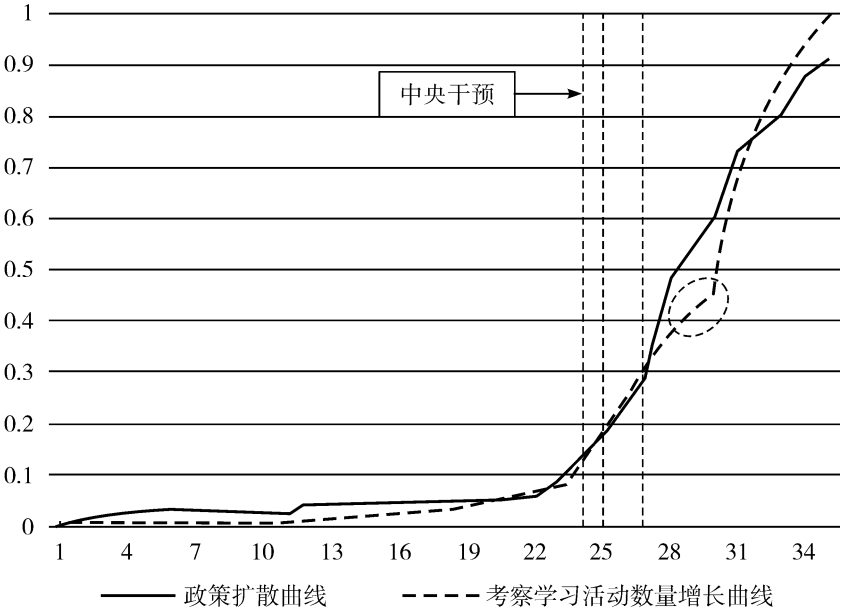


**图 4　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扩散曲线及其考察学习活动数量增长曲线**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但是，就扩散曲线而言，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呈现出与传统渐进政策扩散模式显著不同的爆发式特征。鉴于在县级层面该政策仍在持续扩散，本文选择从地市级层面观察其政策扩散过程。我们以某一地级市管辖范围内首个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挂牌事件作为其政策采纳标志，并将挂牌时间作为其政策采纳的时间节点，通过计算单位时间内的累计采纳频率，绘制其在地级市层面的政策扩散曲线。数据显示，自 2016 年 9 月 1 日江西新余（分宜县）首次采纳该政策

起，至2019年7月31日止，该政策在地级市层面的累计采纳频率已达91.02%，趋近饱和程度。如图4所示，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扩散曲线（实线）在整体上呈反R型①，在整体扩散过程的前三分之二个周期内，累计采纳频率不足10%，而在后三分之一阶段，累计采纳频率短时内急剧攀升至90%以上，这一扩散过程呈现出“前期缓慢增长—后期急剧爆发”的两阶段非渐进特征，而以S型政策扩散曲线为代表的传统渐进政策扩散模式呈现的则是“初期缓慢增长—中期快速增长—后期趋缓饱和”的三阶段过程。

## 五、理解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扩散过程的作用机制

实践中，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存在先挂牌后建设和先建设后挂牌两种模式，通过比较考察学习活动的发生时间与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进度，可将两者关系划分为先学习后挂牌、建设中学习（未挂牌）、先挂牌后学习及学习后暂无进展四类。数据显示，四种类型各占37.45%、24.51%、23.72%及14.33%。建设进度数据表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周期大致为3－9个月，据此可以推断，“建设中学习（未挂牌）”的一类在融媒体中心建成挂牌后，会转变为“先学习后挂牌”的一类。图4中由虚线构成的曲线代表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考察学习活动的数量增长过程，可见，在相同时间周期内其与该政策扩散曲线的走势高度一致②，充分说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挂牌数量与以此为主题的考察学习活动在时间维度存在伴生关系。显然，两条曲线的走势都受到中央干预行为③的显著影响，表明基于纵向府际关系的中央压力机制对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爆发式扩散过程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其政策爆发过程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将探讨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府际考察学习活动对其快速扩散过程可能存在的影响上。那么，回归到前文所搭建的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扩散的过

① 因其扩散曲线呈现出的“初期缓慢增长—后期急剧爆发”的过程特征与R型扩散曲线“初期急剧爆发—后期趋缓饱和”（杨志、魏姝，2018）的特征大致相反，故将其命名为反R型扩散曲线。

② 图4中圆圈部分对应的时间为2019年1月至2月，对于这一时期考察学习活动数量增速放缓的原因，初步考虑是元旦及除夕等周期性节令因素对地方政府工作及出访行为安排的影响，这一分布特征与马亮（2019）对中国城市间考察学习活动频次的月份分布数据特征一致。

③ 图4中3条垂直虚线代表中央层面对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密集干预行为，由左及右分别对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相关指示、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的召开以及《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的发布。

程分析框架，横向府际考察学习究竟以何种作用机制加速了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扩散过程呢？

### （一）考察学习通过知识转化机制加速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扩散过程

如前所述，横向府际考察学习主要通过外部化、社会化及整合化等三种微观知识转化机制促进政策扩散过程，上述作用机制的实现有赖于考察学习活动主客体的共同努力。其一，考察学习活动客体通过外部化机制实现了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隐性知识的外显化过程。隐性知识的清晰程度是政策知识获取的关键，政策源创新者将其隐性经验和感悟转化为编码式的显性知识是潜在采纳者知识获取行为的起点。诸多“明星城市”对自身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经验的模式化总结与标准化归纳，即是此类外部化机制作用过程的典型体现。表面上看，模式化、标准化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方案具有较高的清晰度和易得性，但本质上其属于“经验”类的隐性知识，而非天然具有显性知识的一般属性。值得注意的是，上级政府的激励显著提升了源创新者对其隐性知识外部化并进行分享的意愿，这一激励过程主要通过选试点和树典型的形式来实现。数据显示，在被考察学习频次排名前20%的地方政府中，九成以上均为不同层级范围内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先行试点市县、现场会/推进会举办地或交流会议发言代表。

其二，考察学习活动主体通过社会化机制实现了对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隐性知识的深度挖掘与高效获取。以现场观摩、互动体验及座谈交流为基本形式的考察学习活动，实现了政策源创新者与潜在采纳者的“面对面”联结，为隐性知识的获取提供了有效工具和有利环境。本案例中考察学习活动的开展还存在多种深度学习模式。例如，内蒙古科右中旗曾选派业务骨干赴浙江长兴进行跟班学习，河津市曾选派工作人员赴浙江长兴进行挂职学习，临沂市兰山区在湖南大学举办了融媒体专题培训班，并对望城、浏阳等地的融媒体中心进行了实地参观学习。此类深度学习模式进一步提升了潜在采纳者对深嵌于过程和行为之中的经验、心得和诀窍类隐性知识的获取效能。

其三，府际考察学习活动主体通过整合化机制实现了对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不同外部知识的融合与再生产，增强了采纳决策及执行方案的科学性。综合借鉴多种外部经验制定与本地治理情境最相适宜的政策方案，是地方政府推进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理性决策选择。一方面，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主体是数以千计的县级行政单位，其必然在创新能力及资源禀赋方面存在差异，不少学习者在赴长兴考察学习后发出“长兴模式我们学不了”的感慨，这意味着县级融

媒体中心建设并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唯一方案。另一方面，融媒体中心的功能实现仰赖于融媒技术的深度发展，融媒技术的快速迭代升级要求治理者必须不断补给新知识，即使那些处于知识链条顶端的“明星城市”也不例外。数据显示，近三成（29.4%）考察学习者拥有不少于两个学习对象或对同一学习对象进行过不少于两轮的考察学习。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在其扩散初期就涌现出多种发展模式，既有单纯依托广电平台的“邳州模式”，亦有“广电+报业”融合发展的“延庆模式”，甚至有被称为“贫困县模式”的“玉门模式”和“武强模式”，多种不同的融媒体中心建设及运营模式，使得潜在采纳者通过整合化机制实现最佳决策方案的制订及适应性调整成为可能。

### （二）考察学习通过距离调节机制促进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扩散过程

其一，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考察学习活动存在“一核多源”的外部知识供给源，有效缩短了知识转移主客体间的空间距离，在提升潜在采纳者政策学习意愿的同时，降低了政策认识所需的时间成本及资源消耗。知识转移的发生首先要有一个愿意共享的知识源存在，外部知识源的数量及分布状况影响潜在采纳者考察学习行为发生的概率及效率。丰富且多元的外部知识源能够满足求知者的异质性知识需求；反之，外部知识源数量稀少且类型单一则可能成为大规模考察学习活动发生的现实掣肘。本案例“一核多源”的外部知识源分布结构极大丰富了其政策扩散网络的渠道及节点密度，使得考察学习对象选择的临近原则在操作层面成为可能，实现了政策知识需求的异质性与知识供给的多样性之间的有效平衡。

其二，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考察学习对象选择的对口原则蕴含着学习者对知识距离和组织距离的最小化追求，知识距离和组织距离的缩短有助于提升外部知识向内吸收转换的效能。尽管扶贫援助及发展合作框架下的考察学习主客体间可能存在较大的知识基础差异，但是固定合作关系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较高的联结强度与信任水平，对知识源可靠性的认可直接影响知识受体对外部知识的后续加工与处理过程。同时，基于此类框架的知识转移过程通常还伴随着物质和智识资源的输送。例如，喀什地区宣传系统曾赴广州参加融媒体中心建设培训班，其主办方为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是“扶贫必扶智”理念的充分体现；日喀则市县级融媒体中心平台的技术支持方（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来自于对其进行对口支援的上海市；天津市西青区和浙江省瓯海区亦曾分别到甘肃省景泰县和四川省阿坝县逆向考察交流，开展融媒发展的专项援助工作。此外，组织距离的缩短有效消弭了因考察学习主客体组织结构差异造

成的知识转移摩擦成本，诸多高新区和示范区选择与其存在相似组织结构的城市进行考察学习即是此一作用机制的充分体现。

其三，诸多由“一把手”直接带队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考察学习活动，缩短了外部政策知识与决策制定及执行核心的决策距离，不仅降低了政策信息在层层上报和反馈过程中的时间消耗，同时有效规避了政策知识在传输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漏损与失真。县委书记及宣传部部长是各地融媒体中心政策制定的核心决策者，宣传部分管副部长、广播电视台台长及融媒体中心主任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任务的主抓者和落实者，决策制定及执行核心对源创新政策知识的直接掌握，有利于缩短采纳决策的制定周期并优化政策执行效果。

## 六、结论及讨论

本文通过将政策学习过程与政策扩散过程相联结，构建了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扩散的过程分析框架，通过对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扩散过程，以及地方政府在推进该政策落地执行过程中开展的横向府际考察学习活动的追踪观察，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就过程机制而言，横向府际考察学习至少在政策采纳决策制定的前、后两个环节影响政策扩散过程。在采纳决策制定之前，它通过提升知识获取效能，加速潜在采纳者对源创新的政策认知过程，进而形塑政策扩散的时空规模特征。在采纳决策制定之后，它通过知识再生产过程实现对政策执行方案的适应性调整，进而优化政策采纳的执行绩效。

其二，就作用机制而言，横向府际考察学习活动通过知识转化机制和距离调节机制加速政策扩散过程。前者主要包含外部化、社会化及整合化等三种方式，对促进政策扩散过程发挥关键性作用；后者主要涉及空间距离、知识距离、组织距离和决策距离等四个方面，对促进政策扩散过程具有辅助性作用。

其三，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扩散过程与以此为主题的考察学习活动在时间维度呈现伴生关系。其“一核多源”的扇状外部知识源分布结构增加了政策扩散网络的渠道及节点密度，实现了知识需求的异质性与知识供给的多样性间的平衡，其考察学习对象选择所遵循的临近原则及对口原则，实现了对不同距离机制的有效调节，在知识转化机制和距离调节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形构了其以反 R 型政策扩散曲线为特征的政策爆发过程。

如前所述，横向府际考察学习与政策扩散的关系在本土化理论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阐释，本文的主要贡献就是构建了两者间的过程分析框架，并进一步

揭示了横向考察学习促进政策扩散过程的作用机制。将横向府际考察学习视角引入政策扩散研究并系统剖析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不仅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取经学习”行为的作用与价值进行了有效回应，亦为丰富本土政策扩散理论框架提供了新的观察切口。

当然，本文所有的探讨均建立在由央地政府共同构成的立体府际关系网络之中，对横向府际考察学习行为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其对政策扩散进程具有决定性作用，更不代表对基于纵向府际关系维度的中央压力机制的弱化与否定。诚如马亮（2011）所言，“尽管我们探讨的是水平关系，但它可能仍然源于垂直关系的影响，并难以剥离上级政府打下的烙印”。政策扩散过程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尤其是对于那些短时内急剧爆发的非渐进政策扩散现象而言，其政策扩散过程的“加速现象”并非是某个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整体而言，中央层面的政策吸纳与宣传推广为政策创新的大规模空间扩散提供了纵向的压力驱动，在根本上决定着其发展演化过程，而地方层面的密集考察学习活动则为快速政策采纳过程的实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本文所搭建的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扩散的过程分析框架，仅仅是探讨两者间逻辑关联的一个初步尝试，个案研究的固有局限亦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有关这一解释框架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以及府际考察学习在不同政策领域、不同知识属性类型政策扩散过程中的作用机理，还有待未来借助多案例比较及定量分析进一步检验与论证。

## 参考文献


常荔、周珊刚、李顺才(2001). 基于知识链的知识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 科研管理，5：122－127.

定明捷、张梁(2014). 地方政府政策创新扩散生成机理的逻辑分析. 社会主义研究，3：80－87.

韩博天、石磊译(2008). 中国经济腾飞中的分级制政策试验. 开放时代，5：31－51.

李云新、刘建平(2011). 新农村建设中的地方政府学习：动因、模式与效果. 中国行政管理，10：48－52.

林雪霏(2015). 政府间组织学习与政策再生产：政策扩散的微观机制——以“城市网格化管理”政策为例. 公共管理学报，1：11－23.

罗伯特·K. 殷(2004).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 周海涛等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马亮(2011). 府际关系与政府创新扩散：一个文献综述.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6：33－41.

马亮(2019). 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网络、结构与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政策简报第五十七期：http：//nads. ruc. edu. cnzkcgzcjb/2cf0c09dd4d542e2ab2abda301885d4e. htm. 2019 年 8 月 16 日访问.

王浦劬、赖先进(2013). 中国公共政策扩散的模式与机制分析.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14－23.

王绍光(2008). 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6：111－133.

杨代福(2013). 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现状与机理分析. 青海社会科学，6：77－85.

杨宏山、李娉(2019). 政策创新争先模式的府际学习机制. 公共管理学报，2：1－14.

杨志、魏姝(2018). 政策爆发：非渐进政策扩散模式及其生成逻辑——以特色小镇政策的省际扩散为例. 江苏社会科学，5：140－149.

姚尚建(2017). 城乡一体化中的治理合流——基于“特色小镇”的政策议题. 社会科学研究，1：45－50.

余光胜、刘卫、唐郁(2006). 知识属性、情境依赖与默会知识共享条件研究. 研究与发展管理，6：23－29.

张克(2015). 地方主官异地交流与政策扩散：以“多规合一”改革为例. 公共行政评论，3：79－102.

赵强(2015). 制度压力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的扩散——以城市网格化管理为例. 公共行政评论，3：103－119.

周望(2012). 政策扩散理论与中国“政策试验”研究：启示与调适.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4：43－46.

朱德米(2007). 公共政策扩散、政策转移与政策网络——整合性分析框架的构建. 国外社会科学，5：21－25.

朱多刚、胡振吉(2017). 中央政府推进政策扩散的方式研究——以廉租房政策为例.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378－384.

朱光喜、陈景森(2019). 地方官员异地调任何以推动政策创新扩散？——基于议程触发与政策决策的比较案例分析. 公共行政评论，4：124－142.

朱旭峰、张友浪(2015). 创新与扩散：新型行政审批制度在中国城市的兴起. 管理世界，10：99－113＋124.

朱旭峰、赵慧(2016). 政府间关系视角下的社会政策扩散——以城市低保制度为例(1993—1999). 中国社会科学，8：95－116.

朱亚鹏(2010). 政策创新与政策扩散研究述评.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87－95.

Berry, F. S. & Berry, W. D. (1990). State Lottery Adoptions as Policy Innovations: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2): 395－415.

Boushey, G. (2010). *Policy Diffusion Dynamics 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hen, W. M. & Levinthal, D. A. (1990).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5(1): 128－152.

Cummings, J. L. & Teng, B. S. (2003). Transferring R&D Knowledg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Knowledge Transfer Success.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2): 39－68.

Davenport, T. H. & Prusak, L. (1988). *Working Knowledge: How Organization Manage What They Know*.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Dixon, N. M. (1994). *Th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ycle: How We Can Learn Collectively*. Lond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Gilbert, M. & Cordey – Hayes, M. (1996).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to Achieve Successfu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echnovation*, 16(6): 301 – 312.

Glick, H. R. & Hays S. P. (1991). Innovation and Reinvention in State Policymaking: Theory and the Evolution of Living Will Law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3(03): 835 – 850.

Graham, E. R., Shipan, C. R., & Volden, C. (2013). The Diffusion of Policy Diffusion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3(3): 673 – 701.

Ma, L. (2017). Site Visits, Policy Learning, and the Diffusion of Policy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Public Bicycle Programs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2: 581 – 599.

Mooney, C. & Lee, M. H. (1999). Morality Policy Reinvention: State Death Penalti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66(1): 80 – 92.

Nonaka, I. (1994). 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5(1): 14 – 37.

Pisano, G. P. (1996). Learning-before-do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cess Technology. *Research Policy*, 25 (7): 1097 – 1119.

Polanyi, M. (1966). The Logic of Tacit Inference. *Philosophy*, 41: 1 – 18.

Rogers, E. M. (2003).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Szulanski, G. (2000).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A Diachronic Analysis of Stickines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82(1): 9 – 27.

Walker, J. L. (1969).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3): 880 – 899.

责任编辑：郑跃平